



哲学应引领时代和塑造时代

——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教育家陈晏清先生

齐艳红



津
沽
学
人

陈晏清先生的代表作

陈晏清先生在南开大学工作60余载,引领和开创了南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特别是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发展。陈先生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哲学道路概括为“返本开新”之路。所谓“返本”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所谓“开新”就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返本”说到底就是返回到原创性学说。只有回到原始文本,才能有效地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曲解和误解,打破后人所附加于原创性学说的种种限制,而将原创性学说的真精神剥显出来。属于“返本”范畴的,都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他主要做了以下四件大事。

“返本”的第一步是拨乱反正。“文革”结束不久,1977年2月,他就着手写作《“四人帮”哲学批判》一书。该书于1979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香港《文汇报》发表长篇书评《最最革命哲学的破产》赞扬这本书,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讲了这本书。

第二件大事是清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哲学思潮,主要是唯意志论和“斗争哲学”。为清理唯意志论思潮,他于1983年出版了《论自觉的能动性》一书。这项研究工作最有意义的学术成果,是纠正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由王国”理论的误解,指出“自由王国”不是认识论范畴,而是社会历史范畴,是指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即人可以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状态。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理论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表述。这个认识,后来成为他对历史决定论和政治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所谓“斗争哲学”是指在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这两个方面中只讲斗争不讲同一这样一种哲学思潮。清理这种哲学思潮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澄清了我国学界对于辩证法同一性范畴的传统解释,提出矛盾的同一性只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而不包括相互转化。这个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由陈先生作为执笔人将其写进了教育部统编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第三件大事是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首先是协助肖前教授主编了新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肖前任主编,黄楠森、陈晏清任副主编)。该书的基本思路是全面确立实践观点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重建哲学的主体性维度。随后,陈先生又在南开组织队伍,撰著了《现代唯物主义导引》(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著),对上述教科书作了必要的补充和深化,主要是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存在论意义。

第四件大事是撰著《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及其修订本,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中否认历史规律的非决定论历史观日益膨胀成为一股势力强大的潮流,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它抨击的主要目标。为回应这种思潮,陈晏清和阎孟伟合著了《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一书,于2007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4年,人民出版社通知陈先生,要将此书收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百年学术丛书”,陈先生当即表示希望出版一个修订本。陈先生说,他就是想把修订本写成一本“保卫马克思”的著作,“在20世纪末形成的世界格局下,面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遭到全面攻击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哲学研究者不发声,等谁发声?”这番话很令人震撼!一个快90岁的老人,还保持着如此胸怀、如此担当、如此气魄,真是令人感佩不已。这使我想起8年前,王新生教授应《学习时报》

之约撰写的陈先生评述,用的题目是南宋诗人郑思肖的诗句“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这诗句可以说是陈先生心态的绝好写照,用它去解读陈先生其人、其文,再恰当不过了。

“返本”不是目的,“返本”是为了“开新”。“开新”就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新的理论、观念的创造,就是理论创新。陈先生认为,理论创新应是原创性的研究,这就必须探寻哲学的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就是时代的问题。哲学要把握的问题是时代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是时代的主题。很显然,我国现今时代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时代哲学研究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1984年,陈先生就提出,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批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现在应当批评的是“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逻辑”。1985年,他就着手准备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思考”为题,申报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秀林教授牵头承担了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李秀林先生热情邀请陈先生参加课题组,并将其列为课题最终成果《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的主编之一。可以说,以李秀林和陈晏清两位教授为代表的这两支作者队伍,是我国哲学界最先觉悟到哲学主题的转换并将这种意识迅速化为行动的一批学者。这两项课题的最终成果均于1990年出版。陈先生主持的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哲学》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开启了南开大学长达40年之久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

陈先生主持的社会哲学研究,是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切入点的。考诸思想史,近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兴起,也是与西方国家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相伴而生的。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前市场经济社会向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就是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讲的现代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这个转型的,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这个转型,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所在,亦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所在,也正是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哲学予以特别关注的理由所在。1998年至1999年,陈先生出版了他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10卷)。丛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说明这种哲学研究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

在汝信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的“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史”部分,在叙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时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工作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的哲学问题为中心,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范式转换,其中最

重要的表现就是领域哲学的兴起”,并在列举了14种领域哲学后提出,“其中,社会哲学、人的哲学、文化哲学是影响比较大的几个领域”,肯定了南开的社会哲学研究是率先实现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政治生活的急剧变化和哲学自身的发展,都把政治哲学的研究推到了一种十分重要而显赫的地位,陈先生又及时地带领学术团队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政治哲学。事实上,在重点转移之前,已经在“社会哲学”框架下研究了若干政治哲学的问题,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政策、社会秩序、社会控制、权利规范、协商民主、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制度正义、公平和效率等,在他指导的博士论文选题中,政治哲学的题目占有很高的比重。所以,就南开来说,政治哲学研究是社会哲学研究的继续,这个调整是原来社会哲学研究框架内的调整。

2003年7月正式确定政治哲学作为南开大学马哲科的主要博士研究方向两个月之后,即当年9月,北京大学举行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研讨会,南开大学研究团队在会上介绍了调整研究方向的基本思路,会上的反应比预想的要强烈得多。这次会议后,政治哲学的研究在许多高校开展起来了。南开大学还举办了两次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政治哲学研讨会。一次是2006年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作举办的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陈先生在会上作了“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的主题发言。另一次是2010年与《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青年哲学论坛等合作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主题是“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两次研讨会,把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全国范围推向了高潮。南开大学自身的政治哲学研究也迅速地全面展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挥了会议举办方的表率作用。2024年,国家正式认定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第九个二级学科,政治哲学研究在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蓬勃开展。这种局面是从南开大学开始的,对此,陈先生感到十分欣慰。

2011年,陈先生光荣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以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为平台,以“志愿者”身份,继续主持和组织政治哲学的研究,主编了“协商民主理论丛书”(8卷)和“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是一套从政治思维方式角度研究国家治理的丛书,共8卷,已于202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成果。

不论“返本”还是“开新”,都是力图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需要,都是以现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包括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的。哲学研究的主题是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社会改革、社会转型到国家治理,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变换的,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行的。马克思说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名言,陈先生在走进哲学的大门时就铭记于心。近70年来,他的全部哲学活动,包括哲学的学习和研究,都力求加深对这句名言的理解,都力争使哲学在反映时代、引领时代、塑造时代的同时,也逐步实现哲学自身的时代化,使之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办
天津日报

学人小传

陈晏清,1938年生,湖南省新化县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196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至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创建人,曾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哲学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第四屆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会常委。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陈晏清哲学文集(8卷)》《与时代同行——我的哲学研究之路》《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修订本)》(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主编“社会哲学研究丛书”“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协商民主理论丛书”。多项研究成果在全国性和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奖。2012年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和特别贡献奖。



层林尽染(中国画)
张葆东

五代十国时期花蕊夫人《宫词》中有一首非常生动的诗,写女孩儿照镜子:

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

却被内监遥见,故将红豆打黄莺。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宫女化了美丽的妆,故意走在水边,偷偷把水面当镜子照。当她发觉远处有人在看她时,连忙假装用红豆打黄莺,掩饰自己在照镜子的行为。

这个场景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女孩儿喜欢照镜子,古今皆然。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发现她们在照镜子,她们多半会做些别的动作来掩盖。作为女性的花蕊夫人一定深知这种心理,所以她不仅能看到有宫女“偷折花枝傍水行”,还明白她“故将红豆打黄莺”是因为“却被内监遥见”。说不定这根本就是花蕊夫人自己做过的事情。

唐代温庭筠有一句词:“弯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镜子是闺阁常备之物,牵连着女子千丝万缕的情怀。弯镜中映照出娇美的红颜,明代女诗人沈宜修写《六妹照镜口赠》:“星眸梦乍舒,宛转看不足。一笑绕春风,含情低黛绿。”镜中是一个眉眼含情的少女。沈宜修的女儿叶小鸾也有照镜诗《春日晓妆》:“揽镜晓风清,双蛾岂画成。簪花初欲罢,柳外正莺声。”充满自我欣赏的闺中闲趣。

镜中的红颜不仅有娇慵可喜的一面,更多时候是顾影自怜。宋代张玉娘“笑比南金身自许,镜弯独抱下妆楼”,颇有孤芳自赏的矜贵。清代周敦颐有《久病经年朝起对镜不觉自叹》诗:“拂镜试新妆,无言暗自伤。但看花上露,

女性诗词漫谈(六)

鸾镜中的红颜

于家慧

愁断九回肠。”镜中看到的是自己不幸的命运。明代董氏妇对镜自叹:“妾怜妾貌胜如花,宝镜空将西子误”,没有“君怜妾貌”,只有“妾怜妾貌”,是对自己的一份爱惜和惋叹。沈宜修镜子为良友:“妆前常对镜,清夜与君同。赖得深相契,消磨岁月中。”对镜顾影,直如审视自我,对着镜中的自己思索这一世沉浮。

北宋欧阳修词云:“照影摘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看到自己的下一步就是思索自己这一生将何处托身,有思,心才会乱。对大部分古代女性来说,嫁一个如意郎君是她们能够梦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于是“镜”这个意象常与相思有关。镜中映出美好的容颜,当这份美好无可托付的时候,便会引发缠绵的哀思。

唐代许多女诗人的相思念远之作都是以镜寄情。常浩的《寄远》:“可怜荧荧玉镜台,尘飞幂幂几时开。却念

容华非昔好,画眉犹自待君来。”郎大家宋氏的《长相思》:“台上镜文销,袖中书字灭。不见君形影,何曾有欢悦。”张窈窕的《赠所思》:“与君咫尺离别,遣妾容华为谁说。夕望层城眼欲穿,晓临明镜肠堪绝。”此时此刻,望着镜中的红颜只有伤心肠断。宋

代女诗人的情感也有通过“镜”这一意象来寄托的,如张玉娘失去爱人后指镜为誓:“怅恨生死别,梦魂还再逢。宝镜照秋水,明此一寸衷。”明镜照彻肺腑,见证她一片衷肠。

对镜思君是古代女性的经典形象,然而镜中颜色变,引发的情怀却不仅限于思念情人。明代女诗人王凤娟的《念奴娇·寄长女引元》,借思念女儿抒发物是人非的感慨:“镜影非前,人情各异,怎禁心摧折。欲诉凭谁,尽在数茎白发。”同为明代女诗人的张引元也有《念奴娇·春日怀家寄母》:“亲老北堂,违菽水、望里暮云遮。事业未成,红颜易改,风景催心折。珠沉璧委,恐惊明镜容发。”除了对亲人的思念,还有对自己人生的一份思索与反省,“事业未成”这样的字眼少见于女诗人的作品中,但吉光片羽,已可见当时知识女性拓展自我生命的愿望。

明代女词人叶纨纨的《满江红·秋思》,描述在明镜前悲叹光阴流逝的情景,更模糊了具体的对象:“正此际、悲凉满目,岁华摇落。镜里流光空自惜,瑶台无路愁难托。奈新来秋鬓不胜悲,浑萧索。”古代女诗人对光阴流逝的感慨可以达到相当的深度,如明代陆卿子《短歌行》:“君不见垂髫儿,倏忽为人父。君不见青娥女,终作东家姥。又不见华堂列绮筵,清歌杂妙舞。须臾烛尽乐无声,寂寥寥寥何所睹。人生亦如斯,一往无今古。白日不肯住,红颜渐成土。短歌行,声最苦。”字字直叩心底,令人如闻警钟,表现了人类对无情光阴的普遍感慨,不亚于唐代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

一面镜子,折射出古代女性多面的人生剪影,镜中的她们有着如此丰富的情怀,“对镜思君”固然是古代女性的经典形象,但绝不是唯一的形象。

第五四〇五期

满庭芳

天津戏剧文旅融合的启示

杨一丹
赵敏



题图摄影:记者 姚文生